

Y753 / 3300 / 29

22
246

目 录

参加突泉县解放初期剿匪斗争的经历片断.....

.....刘 旭口述 张永森整理 (1)

回忆我给东蒙自治军去突泉解救胡秉权同志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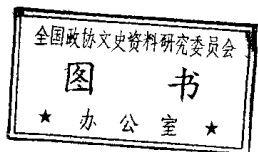
当向导的经过.....胡文革口述 张永森整理 (13)

✓ 突泉天主教会和天主堂.....袁树丰 (16)

突泉同和玉药店始末.....王华章 (27)

突泉县体育春秋.....杜祥云 (35)

“九一八”事变吉林陷落见闻的片鳞只爪.....陈彦博 (50)



参加突泉县解放初期 剿匪斗争的经历片断

刘旭口述 张永森整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军出关来到东北，先后在沈阳、法库等地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接着又到辽吉行署（辽吉省的派出机构，也就是辽北省的前身，行署当时设在洮南）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行署派我和一批干部共二十多人随地委书记张维祯同志来突泉县工作。到突泉后我被任命为城关区区长（当时城关区管辖的范围，除了现在的突泉镇管辖的范围外，还有太平乡的三合屯、溪柳乡的贾屯、洪屯、圣心屯、大营子等地，区委书记沈学莲先已到任）。当时突泉县刚刚解放，虽然县、区政府已经建立，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但是国民党和伪满的残余反动势力尚未彻底肃清，农村中有多股土匪到处流窜，他们互相勾结，为非作歹，给我党的工作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危害。我到职不久就参加了剿匪的斗争。现在仅将个人亲身参加剿匪中的一些经历，回忆叙述出来，以供大家阅读参考。

（一）当时突泉县的形势

一九四五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大地重见光明。饱受日本侵略者奴役压迫十四年之久的突泉县人民，喜庆祖国光复，盼望从此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可是，日寇虽然战败投降，但在他们羽翼下

的汉奸、特务、警察、伪官吏和封建地主阶级等残余势力却不甘心灭亡，趁我军尚未到达之机，大肆活动，组织反动武装，打出各种旗号，占据城镇和乡村，继续欺压广大人民群众。在县城里，由高德恒（福泉源烧锅的大掌柜）、周连庆（当过旧中国警察中队长和伪国兵连长）、刘海山（马贩子，因会俄语，给苏军当了几天翻译而登台，外号刘大马棒）、官希武（旧中国和伪满初期曾任过警察中队长）等人为首组织起突泉县地方维持会（后来改称“后援行政委员会”），代行伪县政府职权，组织武装，发行“流通券”，派捐要款，欺压百姓；潜伏洮南的国民党分子张一揆窜来突泉，伙同王政仕、王怀庆等人拉拢搜罗一些头面人物和伪残余成立突泉县国民党部，大量发展党徒，大搞反动宣传，为国民党涂脂抹粉，恶毒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乡村，一些旧中国时的惯匪和反动地富分子也乘机而动，占山头、拉杆子，打着“光复军”、“草上飞”、“大主意”、“青山”、“占一”、“海蛟”等匪号，到处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危害人民。这几股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给突泉县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为了开辟工作，解放突泉，拯救灾难中的人民，一九四五年冬，中共西满分局派遣我军某部政委胡秉权同志率领部分战士进驻突泉县，接管了维持会，开展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国民党分子张一揆逃离突泉，一些土匪络子远遁山林，周连庆、刘海山、官希武、冯子臣等维持会头目表面上服从接管，暗地里却勾结“光复军”头目马云山和匪首“草上飞”（项成生）等进城发动叛乱，扣压了胡秉权政委并妄图杀害，幸亏东蒙自治军得知消息，及时派出“双宝”部队从王爷庙（乌兰浩特）星夜赶来突泉，打开县城，救出了胡政委，解散了维持

会，打跑了“光复军”和“草上飞”匪伙，使突泉人民免受了一场灾难。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军骑兵旅旅长朱继先奉命率部队和一批干部开进了突泉县，成立了由董荆玉同志为县长的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和“二五”减租运动，镇压了维持会头目周连庆、陈玉山，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了广大群众，使工作很快地打开了局面。但是，那些漏网和尚未被消灭的匪首们野心不死，继续与我军对抗，进行垂死挣扎。这些匪徒们从突泉县城溃逃后，一部分窜到农村到处打家劫舍，坑害百姓；大部分窜往洮南、白城子^同附近几个旗县的土匪合流去攻打白城子。在白城子被我军击溃后，这伙匪徒有的跑到敌占区，多数又窜回突泉，再拉山头，向我军进行猖狂反扑。先后制造了在长春岭截军车、在哈拉沁截击我军干部、在太和杀害我军战士、在太东小福录沟杀害我党干部石涛等同志、围攻永安和杜尔基区政府、伏击高家炭窑土改工作队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如不彻底消灭这股反动势力，就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保障，革命工作就不能够顺利进行。为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保卫人民，我军骑兵旅、县大队、区小队、自卫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集中兵力，统一行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彻底消灭了反动土匪武装，保卫了胜利果实，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我亲身参加剿匪经历中的几个片断

兴龙山冒险袭“占一”

匪首“占一”姓李，水泉乡火犁公司即现在的联合村人。突泉光复不久他就拉起绋子，很快纠集了一百多名匪徒，经常活动在突、洮两县边界地带，大肆强抢行劫，袭击我军车辆，危害较大。一九四六年

七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情报，说“占一”匪伙正在三合屯、大青山一带活动。为搞清情况，我又派人出去侦察，夜间十一点左右，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据群众反映，土匪们可能去了兴隆山。我再次派人侦察，直到后半夜一点多钟也没回来。我担心侦察人员的安全和怕群众受洗劫，决定亲自带人出去察看情况。我向沈学谨同志说明情况后，带上区中队的一个班战士（十三个人）和一辆马车、一挺机枪出发了。出城后，一路搜索前进，过了三合屯、大青山、下甸子，都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等到了兴隆山屯西山（离县四十多华里，归太平区管辖）时，太阳已经快冒红，附近屯子的农民已有下地干活的了。可是从山顶上看兴隆山屯子里既无人下地，也不见烟火，估计土匪们已卧在村子里了。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决定进入屯子里去侦察。心里想的是，即或同土匪遭遇打起来，县里肯定会派部队赶来，同时驻扎在太本站（在兴隆山东南二十多华里）的我军骑兵连听到枪声后，也会很快增援，土匪就跑不了啦。于是，我作了战斗部署。命令大车和机枪手在屯西隐蔽，留下一半战士在村外观察土匪动向和准备接应，我带着通讯员和几名战士摸进村子里去。进村后，走了几家房舍和墙外观察，没发现什么情况。又走到屯子西头一个大院外面停下来，命令几个战士摸到大院里正房顶上去观察警戒，我带着通讯员走进了院子里。这所大院里有六间正房，东西各有三间厢房。西厢房是碾房，从正房里没看见什么，院里只有几个妇女和小孩在走动，可是朝东厢房看时，先是闻到了炒菜的香味，接着看见靠南边的一间房子敞着窗户，炕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在喝酒，外间屋有一个妇女在炒菜。这引起了我的警惕，估计这个人不是农民，因为一般农民哪有早上起来就炒菜喝酒的呢？赶紧持枪向这间房子前进。这时，屋

中喝酒的人可能也发现了外边有人，他放下酒盅，从腰里掏出一个黑布包来，没等把包完全打开，里面已露出了枪口准星。我和通讯员同时开枪，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腿，通讯员冲进屋去下了他的枪（是一只苏式左轮新手枪）并把他看起来，我和后进院的二名战士继续搜查，在正房里又发现了一个夹壁墙，墙外有洞口用簸箩盖着。把房东叫来问他里边有没有人？他说没有。叫他带我们进去他却站着不动。我们分析肯定有问题，就用枪逼住洞口喊话说：“里边有人不出来，就要开枪和扔手榴弹了！”里边果然有人喊：“别打，我们交枪。”说着，先递出两只枪，随着爬出三个人举手投降。这时，在房上警戒的战士报告说发现屯子外东边的高粱地里有动静。我立即命令战士们带着俘虏和枪支撤离出村。等我们出村与屯外的战士会合后，看见屯子东边地里有人在活动，再往东还出现了骑马的。为了免遭包围，我叫战士们坐大车押着俘虏向西北方向撤退回县，我则骑马向西南方向的山上驰去。上山后我向出现的土匪群里打了几枪引诱他们追赶，以便掩护战士们安全撤退。接着，我骑马奔向马拉湖，经下甸子、四海屯回到了县城。这时候，战士们也坐着大车押着俘虏全部平安地回来了。通过审问俘虏，他们承认都是“占一”络子的。那个喝酒匪徒姓林，是个小头目，报号“大神字”。另外三个人都是兴隆山本屯的，刚入伙不久。因为这几个匪徒多与水泉区有关，过了几天把他们交给水泉区政府去处理了。据后来抓到“占一”络子里的匪徒们供认，我们那次进村时他们已经发现了，但是以为我们是路过，怕暴露行踪没动手，等事情发生后想动手已来不及了。我们出村后，匪徒们想追赶又怕遭伏击，随后他们就被县里派去的部队和驻太本站的骑兵连截住了。两边夹攻，土匪伤亡很大，只得向洮南边界逃跑才没被消灭。

我那天刚回到区上，秘书就告诉我说：“朱司令员（朱继先）和路书记（路肖寒）叫你马上去县委。”我到县委见到朱司令员和路书记后，向他们报告了情况。朱司令员批评我这件事做得有些盲动和冒险，我当时还想不通，觉得不主动去打土匪怎么能保护群众？朱司令员又说：“你为什么不多带部队？如果真被土匪包围，现派部队接应恐怕就来不及了。”并问我遇见接应部队没有？我说没看见。因为我是从另一条路回来的。后来才知道，部队首长和县委领导得知我们走的情况后，很为我和战士们安全担心，立即派出一个连去接应，并且同“占一”匪伙遭遇，打了一仗，土匪们才逃跑了。事后回想特别是现在总结起来，当时那样做确实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只是因为我们的行动迅速，使匪徒们措手不及，才侥幸得手。同时对于首长对我和战士们的关怀爱护之情也深受感动。这种情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里才会有的。

高家炭窑土匪伏击工作队

为了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四六年八月上旬，县委组织了一个工作队，深入到杜尔基区的几个重点村中开展“剿匪反霸”和“二五”减租运动。工作队由县委书记路肖寒同志带队，我和陈国良（杜尔基区区长）、董国芬（县妇联干部）同志各抓一个点。我带着十多名工作队员到了十一户（现在的和平），经过四十天的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成立了农会、自卫队、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组织，清算斗争了恶霸地主齐士敦，发展了一批党员（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都是秘密发展）并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工作效果较好。这时，路肖寒同志让我去王老八屯（现在的解放）抓开辟新点的工作。当时的形势很紧张，国民党撕毁了国共双方签署的停战协定，大举向

解放区进攻。进攻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打到通辽、开通、开鲁一带，国民党的飞机还飞到突泉县上空撒过传单。这使突泉境内的土匪和反动势力更加嚣张，乘机大造谣言，大搞破坏活动。而我要去的王老八屯，既是交通要道（向南通往杜尔基至突泉县城，向北通往他克吐至王爷庙，向西通往六户，向东通往洮南县的五大泡子、二龙索口直至镇西），又是靠近几个土匪头子老巢的地方（在屯东不远的六合屯是“青山”——邵荣廷的老家，在屯西南的张福有屯即现在的裕民是“草上飞”——项成生的祖居地，而“海蛟”——徐海峰则住在屯南的刘八沟）。这是一处很重要的地方，如果把工作开展起来，对群众是一个鼓舞，对反动势力则是一个沉重地打击。经研究，组成了由我带队的十七人工作队，队员除了从十一户带去两名外，其余的都是由县教员训练班抽调的。同时，还向六合屯派了工作队（由王振同志带队）。工作队组成后，立即动身前往，我因汇报前段工作晚去了三天。我到达王老八屯时，队员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查工作，我又同他们到各屯走了一遍，进一步了解情况和察看地形。这个村共辖三个屯，村公所设在王老八屯，工作队集中住在一个地主大院里。往北不远是高家炭窑屯，往西偏南几里路是张福有屯，向东北不太远就是归洮南管辖的五大泡子了。根据几个屯子的情况，工作队做了分工。去高家炭窑和张福有屯工作的各四个人，其余的留在本屯，我则做巡回检查，掌握整个村的工作情况。因为这一带土匪活动频繁，我告诫队员们要多加小心。并规定去外屯的人要当天回来，走时候统一出发，拉开距离，注意观察，免遭意外。尽管这样做，还是被土匪钻了空子，对工作队实行了突然袭击。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早上四点多钟，去两个屯的工作队员分别出发了，我因事留在村里没动。

去高家炭窑的队员刘广林、朱如杰、高元和、于巨文四人，都骑着马，只有于巨文带着一只步枪。他们出村时间不太长，我在院子里就听到了北面有枪声。我赶紧一面上房观察，一面命令队员老孟带几个人出村接应出去的队员。老孟等刚走，高元和就跑回来了。他报告说，他们四个人出村走了不到一半路，在高粱地里遇见了胡子。于巨文在前边发现情况后鸣枪报警，打马冲了出去，朱如杰、刘广林也跟着冲，他在最后面撤回来，只听到土匪打枪，详细情况不明。他刚说完，老孟已和同去的几个人把朱如杰同志抬回院内，我到跟前一看，已经中弹牺牲了。接着去张福有屯的几名队员也回到村里。他们说，在张福有屯附近地里也藏着胡子，听到枪响我们往回撤，而藏在地里的胡子也起来奔向高家炭窑方向，两股土匪合起来有四十多人，已经钻到屯北边的高粱地里去了。（第二天晚上刘广林也回到村里，他说发现土匪后，于巨文打了一枪骑马冲过去了，朱如杰跟着冲，被胡子一枪打下马，他被几个土匪包围拉下马，拉到高粱地里看着，夜间趁土匪没注意跑出去，转了一天才回来）。我听了情况后，一面派人骑马去区政府报告，一面带着部份队员出村到土匪隐藏的高粱地周围进行监视，以免被其跑掉。过了二个来小时，陈国良同志带着区小队战士来到现场，王振同志也带着工作队员从六合屯赶来，共同把土匪隐藏的那块高粱地包围起来。但是土匪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硬攻不利，只好等待时机。这时，战士们发现高粱地边上趴着二个人，把他们带到我跟前。经过盘问，承认他们是瞭水的。陈国良同志接着告诉我，他们来时路过一个地窝铺，满地是鸡蛋皮，说明土匪曾在那里隐蔽过。同时在那还遇到一个人，问什么也不说，已派人把他送到区政府去了。正说之间，战士们又报告：“山下有四个打洋草的，可是只有两

个人打草，另外两个人站着不动，形象可疑”。我同王振同志立即带人到那里一看，果然只有两把镢刀。盘问那两个不打草的人是干什么的？他俩吱吱唔唔答不上来。一搜查，这俩人身上带着大烟还有几块银大洋。另外两个打草人说不认识这两个人，他们是枪响以后从高粱地里来的。于是，我又派几名战士把这两个人也送到区政府去审查。

我们在地边监视了一天，土匪们始终藏在地里不动。可是到半夜时，他们趁夜黑头的机会突围向五大泡子方向逃跑了。第二天一早，六合屯的群众来报告，说有一个胡子昨夜晚回家去了到现在还没走。我立即带人赶到六合屯这名土匪家里抓他，这个家伙发现情况后跳窗户跑到后山地里去躲藏，最后还是叫我们赶上抓住送到区政府去了。这次事件，我工作队队员朱如杰同志不幸牺牲，但却擒获了六名土匪，使反动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对擒获的土匪，经过审讯，将其中罪大恶极的予以镇压，为烈士报了仇。通过审讯得知，这次土匪伏击工作队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在工作队进村后，六合屯的反动地主胡明山找到匪首“青山”说：“后屯来了清算班，要抓胡子和斗争有钱的人家，我们不先下手就要遭殃。特别是刘旭那小于是个头，听说手挺黑，得想办法干掉他”！他们经过暗中察看了工作队的活动规律后，策划了这次伏击事件。偏赶上那天我没出村，本人虽幸免遇难，朱如杰同志却为革命牺牲了。

杜尔基区政府的反包围战

“高家炭窑”事件发生后，在一些工作队员中引起了思想波动。有的人找理由请假回家，极个别则私自走了。鉴于这种情况，经与路肖寒、陈国良同志研究，决定把工作队撤回区里进行整顿，以利再战。我们回到区政府不久就接到了群众报告，“青山”已同“草上

飞”、“全好”、“小白龙”等几股土匪勾结一起，共有二百多人，要来攻打区政府、解救被擒获的匪徒，为他的弟兄们报仇。接到情报后，路肖寒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会议，对怎样防备土匪袭击，做了周密研究并制定了具体措施。一面派人回县报告情况并调遣军队来打这几股土匪，同时把全区干部、区小队和工作队员组织动员起来，把人、枪、机密文件和擒获的匪徒都撤到大有庆烧锅院里（墙高、四角都有炮台，易守难攻）坚守，待县里部队到达时，里外夹击，消灭这股匪帮。就在我们做完部署、人员全部进入大有庆烧锅院内的当天傍晚，土匪们从杜尔基屯子的东北和正东方向攻上来了。他们先是占领了杜尔基后山的制高点，想居高临下集中火力一次突破，但经过几次火力交锋却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接着，土匪们又分成几股从几个方向进攻也没攻进来。夜幕降临以后，土匪们终于攻进村里，一度占领了区政府的院子，可是靠近不了烧锅大院，每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战斗到夜间十二点的时候，被临时关押在烧锅院里的土匪和几个犯人，乘看守他们的战士的注意力转向墙外之机，突然骚动向外跑，想爬墙跳出去和外边的土匪们汇合。我和战士们发现后，立即向他们头上连续鸣枪警告，几个战士冲上去把他们赶回原地，制止了他们的骚乱。这次战斗一直打了半天一夜，由于县、区干部和战士们团结一致，艰苦奋战，尽管土匪们来势汹汹，多次疯狂进攻，始终未能打进大院。天亮以后，县大队的援兵赶到，从背后向土匪发动了猛烈攻击。“青山”等发现形势不妙，怕被围歼，赶紧撤退。区小队队员们立即冲出去和县大队的战士们一起乘胜追击，匪徒们狼狈逃窜，又以失败而告终。

闹牛山前遇“花蝴蝶”

击溃了围攻杜尔基区政府的土匪后，工作队进行了整顿和训练。

在此期间，领导上让我带着几名区小队员到各村巡回检查工作情况和调查了解土匪的活动情况。有一天，在闹牛山前同匪首“花蝴蝶”不期而遇了。

“花蝴蝶”是个女匪首，蒙族，不知姓名和籍贯，听说是因婚变离家出走后拉杆子的。她这个络子大约五十左右人，蒙族和青年人居多，人人双马，流动性大，是从科右中旗那边窜过来的。开始时是窜到那里就在那里要吃要喝，完了就走，偶尔进行抢劫，后来发展到攻农会、打干部，特别是对妇女干部手段残忍。我军对其进行了围剿，因其人少马快，打了就跑，一时未能集歼。我遇到她那次是在高家炭窑北边闹牛山前面的一座小山上。当时我骑着马带着几名区小队员正在查看情况，走到这座小山下时看见山顶上有人骑在马上东张西望，细看还象个女的，因而引起了我的怀疑。同战士们打招呼后，我骑马向山上驰去並开口问她是干什么的？这时她答话了。问我：“你是刘旭”！我说“我是刘旭。你是谁？”她又说：“你敢上来”？我接着说：“我上去你又怎样！”我一边说着一边骑马向山上冲，她开枪打我，我也开枪还击。不等我冲到山头，她骑马掉头向山下跑去。等我冲到山顶时，她已退到山角下回头还对着我叫号，並用双枪开火，但打的不准。这时候我肯定她是“花蝴蝶”了，我和战士们紧追不舍，两下是一边跑一边打，等赶到另一个山头时，从山后起来一伙骑马的匪徒，同她汇合一起向山里撤走了。我因当时我方人少，马也没土匪们的马快，就没有再追击，领着战士们回区政府了。过了三、四天以后，区政府又接到情报说“花蝴蝶”络子正在包金才屯（现归哈拉沁乡管辖）活动，我带着几名区小队员去侦察，走到这个屯子的后山顶时被土匪的瞭水的发现鸣枪报警，匪徒们利用屯中的房屋和树木做

掩护，冲出村外跑了。

工作队通过整顿后又深入到各重点村中去开展运动，我则回到县里继续主持城关区的工作，此后就没能再亲身参加剿匪的战斗。随着前方我军的节节胜利，突泉县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农村各群众组织都建立了，加上我军集中力量对土匪进行围剿，匪徒们成了过街老鼠和丧家之犬，无处容身，纷纷溃散，到一九四七年底，突泉县境内的土匪已被彻底消灭。匪首们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活捉，有的当时虽然跑掉了，但在全中国解放后仍未能逃出法网，终被擒回，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一九四八年春的一天，我因事去县公安局，马成局长对我说：“花蝴蝶押在监狱里，你们曾经是对手，不看看她吗”？我好奇心起，心想我同她虽然面对面的打了一仗，但却没看清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便回答说：“去看看。”在马成同志陪同下，我到监狱里看见了。原来“花蝴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人长的很文静瘦弱。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她是一个会使双枪又很强悍的女匪首的。我问她：“你认识我吗？”她抬头看我一下说：“你是刘旭区长”。我告诉她：“你只有坦白认罪，政府才能宽大处理”。说完后我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马局长告诉我：“花蝴蝶已被上级提走送到哈尔滨去啦”，她后来的结果就不知道了。

回忆我给东蒙自治军去 突泉解救胡秉权同志时当向导的经过

胡文革口述 张永森整理

东北光复那年，我二十一岁，住在铁庄子（现在的永安乡永德村）务农。旧历十一月初四，屯中一位老年人病故，我和邻居们去送葬，下午回屯时，遇到不少屯里人往村外跑，说：“来蒙古兵了”。我因惦记着老人，赶紧往家走，刚走到屯子里就遇上十来个穿军装骑着马的兵把我拦住了。一个看样子象是当官的人对我说：“我们是东蒙自治军。从王爷庙来，要去突泉和高力板。原来有俩个拉道的走到这里就不知道路了，而且还不会说汉话，想让你给领领道，去一趟突泉怎么样？”这个人说话挺和气，可是我心里却很害怕。便推说家中老人有病离不开，去不了。但是他们不答应，非叫我去不可，并派了俩个兵跟着我回家同我母亲去说。我母亲很怕兵，心里不愿意，嘴上却不敢说，只好答应说行。这时，他们在屯中又找了一个年岁和我相仿的王修（我们是亲属），由我俩领着他们出村了。出了屯子以后，我们看见了部队，大约有二、三百人左右。骑兵、步兵各占一半，还有几台大车。车上拉着机枪、迫击炮和四个女兵。在赶车的老板子中，我认识的有我们后屯乌兰嘎查（归前旗管辖）的老谢和老包。部队发给我俩一人一件黄军大衣穿，还给一匹马骑着带路。从铁庄子走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当天晚上走到佟家营子（现在的哈拉沁乡团结村）分散到各家住下来。部队待我们很和气，我们在屯子里走动也很随便。通过和当兵的们闲谈、唠嗑，我认识了一个名叫何子升的连长和一个

大伙都叫他老包头的官。听他们告诉我只知道，这支部队叫“双宝部队”，去突泉是为了救被突泉维持会扣押的八路军胡政委的。第二天一早部队从佟家营子出发，经过二十一户，到王振录屯（现归东杜尔基镇管辖）打的尖，下午快走到突泉北河北岸的霍家屯时，听见从屯子里向外打枪，可能是城里维持会已经知道了消息，做了准备。这时候部队立即转向，从屯子外绕向西北经现在的苗圃后山，开到于家洼子屯（现在归溪柳乡管辖）住下来，做打仗的准备工作。第三天早晨部队叫我跟着骑兵、炮车和机枪班一起开到西大营子（现归溪柳乡管），晚上又叫我跟骑兵到了李振方屯（靠近现在突泉镇宏发村不远），而步兵则开进了圣心屯（现在溪柳乡所在地），当夜夜间部队缴了西天主堂的六支枪，并向突泉县城方向打了一阵枪、炮。第四天上午部队集合开会，一个当官的在队前讲话说要打突泉城。听当兵的们告诉我，给部队讲话的人就是双宝。这时，我看见在部队里有五个穿青色衣服、打着绑腿、戴着驳壳枪、说话很倨的人。我问何连长这几个人是干啥的？何连长说：“是八路军”。这天一整天部队都做打仗的准备。擦枪、发口令、大车装上炮弹、子弹，每个兵的帽子上都缝上一块白布（以便夜间认记），天黑后又换了一次口令。半夜以前，从部队中挑选了二十五个人，连同那几名八路军一起出发，偷偷摸到城里去做内应。到了夜间十二点左右，双方开始接火，机枪、步枪响个不停。一直打了两个多时辰，枪声才逐渐稀落，前边传信说已打开了县城。到天放亮的时候，部队全都开进城里，大车进了陈家店，我和王修被领到东烧锅（现在粮食汽车队处）的后院呆下来。进城时，光看见一些买卖家门口上挂着欢迎的红旗，但是大街上却没人行走。我们进了东烧锅后院不久，老包头从前院过来对大家说：“胡政委已经救出

来了，就在前院呢”。我和一些兵要到前院去看看，当官的不让。我爬上烧锅大院的东墙头上向外看，瞧见城外东山上有一些骑马、步行的人越过山梁走了。住下以后，听何连长、老包头等讲起经过我才知道，县城里原来是由维持会和“光复军”（实际上是胡子）占据着。八路军的胡秉权政委到突泉县开展工作，维持会勾结胡子进城扣押了胡政委，“双宝部队”是为了救胡政委才来打突泉的。

“双宝部队”打开县城赶走“光复军”后，在东烧锅的门口挂上了城防司令部的牌子，县城四门派兵把守，街里巡逻的兵都戴上黄胳膊箍，并抽出一些兵三个人为一组，到一些人家去搜查。我跟随一组兵查到伪满警察署的阎署长家西屋时，从高粱囤子里翻出一棵撸子枪来。过了三天后，我在东烧锅院里看见部队集合了二十多人、一台大车，还有二名女兵，由一个当官的带着走了。过后，何连长对我说，当官的是阿斯根，带着兵和大车去高力板了。

我和王修在城里呆了五天，部队待我们很好，回家时还给发了路费。到家以后，遇见了王国臣（大地主，蒙族名子叫满固。家在我们屯，他本人常年在王爷庙呆着，他的几个弟弟都在王爷庙当伪警察，王本人在土改时被农会从乌市抓回来镇压了）听他说，“双宝部队”打突泉时他也去了。当时双宝曾派他进城找维持会的头目周连庆等人传话，叫维持会把胡政委放了，周连庆他们不答应，才开打的。他还说，随“双宝部队”来的几名八路军是从镇赉县到王爷庙的，是奉上级命令找东蒙自治军联系出兵到突泉救胡政委的。

事情已过去多年，个人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望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士予以指正。

突泉天主教会和天主堂

袁 树 丰

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亦称罗马公教或加特力教。天主教是罗马公教在我国名称。

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已经很久，据说在唐太宗时陕西就有外国传教士传教，当时被称为景教。十六世纪初，随着中国同外国通商的发展，在东南沿海一带建立通商口岸，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一些传教士随之来中国传教，葡萄牙传教士首先在澳门获得立足点开展活动。一五八二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先在澳门学习汉语，第二年同教友罗明坚到广州肇庆建堂传教；一五八九年到韶州与瞿太素研究四书五经，做拉丁文译文和注释；一五九六年在南昌任耶稣会在华总会长，主张把孔孟之道与天主教教义相融合；一六〇一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到达北京，向明神宗朱翊钧献自鸣钟、八音琴、圣像等，获准常驻北京传教的权利。随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有汤若望、利类思、张城等人，到明末时中国天主教徒已达四万左右人。汤若望在明、清两朝均供过职，编过《崇祯历书》；利类思翻译过托玛思、阿魁那的《神学大全》；张城是北京西什库教堂（北堂）的创建人，清康熙年间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时曾当过译员。鸦片战争前后，北京、天津、东南沿海一带的通商口岸、中心城市等处，都有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到了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的前夕，天主教会已差不多遍及全国各省，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已达三千多人。一八六五年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获得了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的势